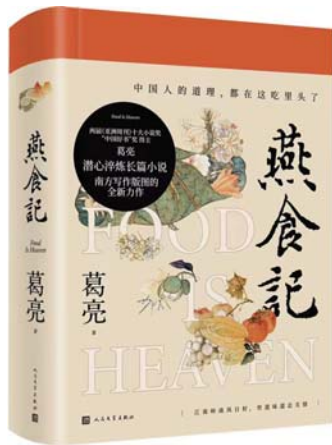


《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
以奥戴德·盖勒 著
余江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燕食记》
葛亮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历史齿轮推动下的繁荣与不平等

在疫情时代，世界的格局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一些国家的债务水平因为蔓延的疫情而不断飙升，乃至陷入艰难境地；还有很多人因为疫情丢失了工作，失去了前行的动力。不论是在国与国之间，还是不同阶层之间发生的变化，都让我们无法假装闭上双眼忽视那些如火山喷发般的不平等问题。在面对、接受和尝试改变之前，恐怕我们需要首先知道这背后最初的成因为何。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奥戴德·盖勒在这本《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中讨论了人类和其他物种之间的不平等、殖民主义、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问题，帮助我们追根溯源，理解不平等的深层次原因。

在书中，盖勒提出了两大问题：第一，为什么人类是唯一摆脱了生存困境的物种？第二，为什么人类之间又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在他看来，由于技术进步、人口规模变化等因素，导致了在过去两百年里，人类历史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用任何合理指标测算，生活水平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全球人均收入提升了14倍，预期寿命翻了一番还多……生活水准的提升并不意味着更好的健康与更高的收入，技术进步还带来了童工劳动的减少，危险与繁重职业岗位的转型，人们可以在遥远距离外相互沟通与开展贸易，大众娱乐与文化空前繁盛，而我们的祖先们对此根本不可想象。”然而，如我们所见所知，技术进步和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并没有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平等地分享，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那么，这些差异背后的根源是什么？是历史的偶然因素还是社会结构性的决定因素？

为了解释这其中的缘由，作者举了两块草坪的例子。尽管两块草坪彼此相邻，但为什么其中一块比另一块更为青翠茂盛呢？你可能会猜测影响草坪生长的是浇水量、光照、土壤质量等等和大自然相关的因素，但这些表面的生长差异其实都来自于某些文化、地理的深层因素，比如草坪背后不同的社区管辖治理风格、草坪主人维护草坪时不同的生活习惯等等。对此，盖勒进一步分析指出，“和两块草坪区别类似的是，各国之间财富水平的巨大差异源于一系列因果关系：表面上是若干直接因素，如各国在技术和教育方面的差异；核心则是更深层与中级的因素，是一切表象的基础，包括制度、文化、地理与人口多样性等。”其中，地理特征是决定文化、制度和生产率演化走向的部分终极因素，影响着人类发展旅程的走向。

地理决定论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提法。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也回答过类似的问题，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富有差异的现代世界是如何形成的。而这其中，环境对于不同文明发展轨迹起着决定性作用，在环境适宜的情况下，动植物驯化促进了粮食贮存，从而人口规模扩大，带来了一系列更深远的影响。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上，制度和都受到地理因素与人类多样性的深刻影响，但它们也容易遭受突发的历史波动冲击，会偶然地改变各国的命运。

自古以来，技术进步都是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技术创新促使食物产量上升，进而提高了人口增长率，直到生产力收益被新增人口的粮食需求所抵消，令生活标准回落到勉强维生的边缘。这在经济学中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源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直到十九世纪，势如破竹的技术进步抵达了一个拐点。工业革命的到来将人力资本的价值抬高到了某个临界点，这时候在人口结构上出现了一个大的变化：男女薪酬差距缩小，女性不再愿意为生育付出太多的代价，于是父母开始选择少生孩子，转而在抚养、教育方面加大投入，让孩子成长为能够适应快速变革技术环境的高素质劳动者。这时候，人们才真正跳出“马尔萨斯陷阱”。

这其中，教育（即人力资本）在社会系统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正如美国公立学校之父贺拉斯·曼恩所言，“教育超越人类其他任何方法，是人类环境伟大的平衡器，即社会机制的平衡之轮”。特别是在愈发分化的社会裂痕之下，教育可以让所有人更加了解自己并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真正掌握自己的人生而不是任由其他因素摆布。同时，教育也帮助我们认识到世界的多元化与不平等，尊重差异的价值观，这些都驱动着人类发展旅程的巨型齿轮继续运转，也能够促进人们相互理解，让不同的思想交流碰撞，实现更强的社会凝聚力。

在过去两百年里，人类经历了若干重大灾难：西班牙大流感、经济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性影响等等。每一次的浩劫都给无数个人和家庭造成了严重伤害；但从更广的历史视角来看，人类整体的生活水准在每次灾难之后亦都得到了恢复。因此，盖勒乐观地预计，从短期看，由于新冠疫情造成的增长进程很容易遭受巨大创伤，但在更长的时间线上却难以影响人类发展的宏大路径。换言之，人类的不懈征途依旧是不可阻止的，终究会共同跨入新的发展阶段。

《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这本书从人类最初脚步出发，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回顾了历史，再剖析了财富与不平等的深层原因。身为经济学家，盖勒构建了“统一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制度、文化、地理等因素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为我们认识世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找到过去的根，是为了更好地设计未来”。

在小说中重现由饮食定格的历史

“一个好厨师的味蕾，必然会有着独特的记忆。”在长篇新作《燕食记》中，葛亮的目光由江南与中原南下，来到岭南大地，开启了一场有关饮食的历史“寻根”之旅。聚焦岭南地区久负盛名的双菱月饼的制艺传承线索，叶凤池、荣貽生、陈五举师徒三代的身世浮沉也随着故事讲述而揭开。从般若庵、太史第到同钦楼、十八行，地点迁移，人事更迭，葛亮笔下岭南近百年的历史却离不开“吃”这一字。饮食穿越了阶层，上至士绅，下至平民，各有各的欣喜与滋味。

《燕食记》着力书写了那些已铭刻在岭南文化记忆中的饮食。小说的目光对准后厨，沿着食材的选用、烹制的秘法，对精妙的饮食文化进行了解密式的书写，也对世人不甚了解、几近失传的饮食技艺与工序，完成了想象性的再现。小说多次书写在般若庵与太史府第举办的盛宴，单是菜名便显其不俗：鹤舞白川、熔金煮玉、太史蛇羹、鼎湖上素……而葛亮对岭南美食的熟稔更是令人咂舌，一日三餐如何就位，不同节日有何讲究，连食物硬软的细节也都谙熟于心，“压席的是红焖山瑞，太史的牙口不好，就舍了冬笋用广肚同焖”。这是《燕食记》的趣味所在，悠久绵长的文化传统在日常三餐中隐隐浮现，人间烟火也就形成了揭开历史的契机。

饮食关乎人情事理，《燕食记》也借饮食展开了一个完整而丰富的人的世界。荣貽生与五举师徒坚韧而朴直，司徒云重机敏而灵动，向锡堃于戏痴情，戴凤行果决而有内劲，即使是书中一晃而过的人物形象，也各有生气与思想——同钦楼的聂师傅惊讶于五举从不偷师，“故意在他眼前，将包虾饺的速度放慢，五举依然故我”，于是“心里忽而莫名失落”；太史第的来娣恃宠而骄，背后却也有着对亡子无法释怀的情感；南天居的袁师傅对荣貽生处处照顾，一句“你还有师父呢”，温热动人。人物形象与食物产生了印象叠合，数十个人物在岭南饮食文化结构的连结之下，相互碰撞，激荡出世情百态。

世事变迁，命运叵测，人物也各有内心的隐痛与伤损。战争对荣貽生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心灵创伤，无论与云重分别的不舍和担忧、行伍路上的遭遇，还是战后得知慧生在轰炸中丧生的悲痛，时代带来的创口几乎无法愈合；妻子凤行的死则构成了五举无法言说的悲痛，“原来是尖锐的疼痛，就是在心尖上疼，痛不欲生。现在这疼渐渐钝了。他便也不再抗拒，由着它去。也就成了日常，朝夕与他同候。”在疼痛化为日常的情境里，《燕食记》不时荡漾起的微妙温情、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羁绊显得格外重要；荣貽生与云重的情愫暗藏和释放，五举与露露属于孤独者的心灵共鸣……艰难时刻的相互慰藉短暂地消磨了疼痛，那些冲突、紧张、遗憾与错过在时间的冲刷下逐渐淡去。如何与自己、与命运和解？或许正像叶七与荣貽生反复提到的，打好莲蓉至关重要的，其实是那一个“熬”字。人生如庖饌，需要沉心等待，需要时间的浸润、磨洗，最终才能香溢四方。

我们都记得普鲁斯特的玛德莱娜蛋糕，在他那里，一口蛋糕配上一口茶，记忆便如海水般缓缓升涨。“攀缘着那味道，竭力要跟着它来到我眼前。然而它在一个那么遥远，那么混沌的地方挣扎，我只能勉强瞥见融入模糊的光色漩涡之中的那道淡薄的反光。”视觉只是记忆的冰山一角，形象微茫，而饮食却赋予了个体重新寻回，定格逝去时光的契机。葛亮显然重视饮食的感官记忆功能，它可以瞬间连通历史现场，短暂却直击内心，一段历史由此定格。

但要在小说中重现由饮食定格的历史，必须提供相应的语言。正如黄子平所言，“必须从语言开始来提供故事的‘在场感’。‘语言’和‘故事’在历史时空上的相契不隔，洵非易事。”《燕食记》的语言准确而考究，长句如滚水般沸腾，短句像是溅出的水花，字里行间流露着典雅气息。那些在瞬间释放人物生命力的句子令人印象深刻。荣师傅成功制作“鸳鸯”月饼后，葛亮写道：“他并没有十分享受同钦楼重新成为了香港饮食界的焦点。他心中的快意，来自一个守业者在落潮时的有惊无险。”荣貽生内心的浮沉感喟，跃然纸上。慧生在太史第内为府内老少施展自己的厨艺时，“她看周围的人变得好起来，有一种将自己的技艺，放在了阳光下的舒坦”，温和性情一目了然。而向锡堃唱到《灯街拾翠》“科科落落居人下，处处长龄酒饭茶。问何日文文章有价”处，唱出才子的跌宕人生。如伊格顿所言，“文学不只关注语言的运用，更强调语言带给读者的感受。它提醒我们，习以为常的语言其实是多么丰美的媒介。”《燕食记》的故事得以在百年历史中穿梭往返，得力于葛亮适宜的腔调，他的语言熨帖而克制，不仅拾起那些由饮食连通的历史与人事，同样由此寻回了中国精深的语言传统。

通过有关历史的讲述，“我”的学者与小说家身份使故事在沉浸与抽离间不断转换，形成平衡。“我”也常会在故事中适时出现，有时将叙述拉回现实，有时则以考据资料补充历史。月傅与般若斋斋的故事便源于搜罗的民间野史，太史公其人性情的书写有资料作辅，甚而在描绘香港上世纪70年代风月场时援引数据，说明其消费之高。葛亮似乎不介意表明他的历史叙事中的想象成分，他曾指出自己是在“想象”而非“重现”历史。的确，由资料重建的历史现场中埋藏着种种断裂与空白，正是在这些历史的断裂处，葛亮以他缜密精细的历史想象力，赋予了那些在现代城市中逐渐消逝的礼制、仪式、文化与生活以重绽光芒的机会。

□ 郑祖龙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曲鹏 美编：颜莉